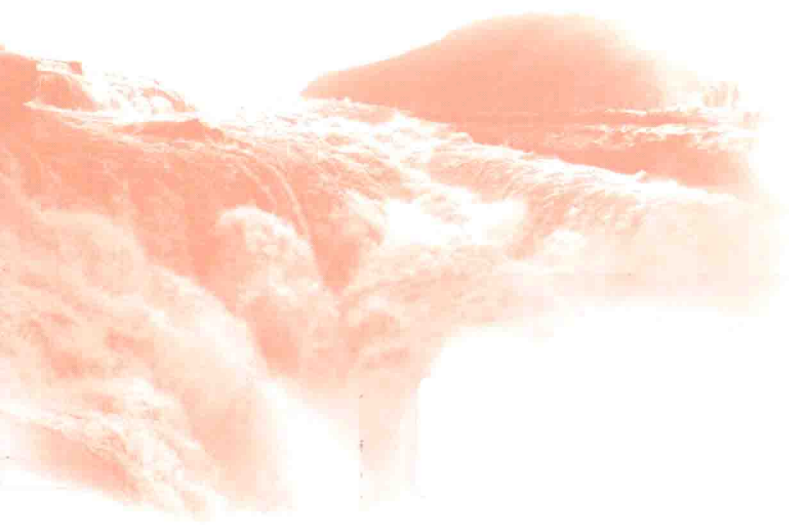


下
册

修
订
版

中国近代 哲学史

冯
契
／
主
编



副主编 / 乌恩溥 卞柏林 曾乐山 翟廷璠

在中国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论争，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的。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哲学革命就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下册

修订版

中国近代 哲学史

冯契 / 主编

乌恩溥 卞柏林 曾乐山 翟廷璜 / 副主编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冯契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

ISBN 978-7-108-04412-9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哲学史—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675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杨柳青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66.25

字 数 800 千字

定 价 119.00 元(上下册)

第三编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阶段

第三编前言

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发展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无产阶级哲学革命的阶段。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哲学思潮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国人民在它的指引下,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无产阶级哲学革命阶段的经济、政治

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所以从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这些原因既有国际方面的,也有国内方面的。

在国际方面,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在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欧洲,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波兰的无产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浪潮。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日益高

涨。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更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首先,在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就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了。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其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时开始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第三,十月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鼓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当中,看到了人类的光辉前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十月革命震撼了中华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忱,推动中国人民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拼搏。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哲学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

在国内方面,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减少了商品输入中国,因此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面粉业,以及火柴、水泥、卷烟、榨油、造纸、制糖、制皂、制烛等轻工业、日用品制造工业,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以棉纺织业来说,华商棉纺织厂,1915年共有22家,1922年增至64家;纱锭在1915年共有544 010枚,1922年增至1 593 034枚;布机1915年共有2 254台,1922年增至7 817台。^①以面粉业而言,战前全国面粉工厂共有四十多家,到了1920、1921年间,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包括少数外国资本家的工厂)。战前面粉一直入超,1915年起的六年中却一变而为出超。

由于民族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因此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了进

^① 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第227—233页。

一步成长壮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强，并要求有更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中国产业工人在辛亥革命时约有六十万人，到五四运动时就达到了二百万人左右，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资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由于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工人运动便有了显著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的40年中，中国有记载的工人罢工斗争共105次，而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几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达130次。有些罢工越出了经济斗争范围，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地方日本资本家工厂中的工人举行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罢工，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表明1915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暂时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了对中国经济、政治的侵略，如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收买控制段祺瑞政府，扩大在华的工厂企业，增加对华的商品输出等，从而使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中国市场。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经济组织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在华开设的工厂企业，控制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纷纷倒闭或破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控制下，发展缓慢，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大，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从而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因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具有妥协性。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下，也呈现出凋敝的景象。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收购原料、倾销消费品的结果，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家庭手工业破产。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然统治着农村。地主阶级不仅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相结合。此外，农民还要交封建

军阀的许多苛捐杂税,中国农民处在贫困破产、饥寒交迫的深渊。因此,他们不断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剥削。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于1927年掌握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集中了巨大的财产与生产资料,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密切结合,不但压迫、剥削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资产阶级。

个体的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约占国民经济的90%,近现代工商业,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商业、官僚资本的工商业,以及民族资本的工商业,仅约占国民经济的10%,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

在政治方面,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并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且出现了复辟封建帝制的逆流。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废除共和,实行帝制。接着是军阀张勋等人于1917年7月请出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虽然都很快就失败了,但这表明辛亥革命后中国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仍然很强大。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支持下,中国还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不息的局面。如1920年6月至7月间爆发所谓直皖战争,1922年4月至6月爆发所谓直奉战争等等。军阀统治和混战不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给中国造成难以统计的损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了所谓“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实际上是英、美、法、意、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它不但没有帮助中国收回失地和权益,反而逼迫中国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有青岛与山东的主权。消息传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

政府的示威游行,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沙、南京、成都,以及其他各地的学生,迅速响应,纷纷举行罢课、集会和示威游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到6月3日以后,以上海为中心,许多地方工人群众走上斗争前列,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经过人民群众的斗争,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宣布“批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和章宗祥“辞职”,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经过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地位。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从此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各地纷纷成立了工会组织。在工会组织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到1923年底,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斗争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其中,著名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等。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1923年到1924年,广东省的农民运动高涨,湖南和广西的农民运动开始发展。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形成。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下,创办黄埔军校,其后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和陈炯明叛变,成立了广东革命政府,建立了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节节胜利,扫荡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工人运动迅猛地高

涨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及声援五卅运动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持续了15个月。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全国各省农民运动也迅猛地高涨起来,其中特别是湖南。到1927年11月,湖南省75个县中,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达到130万人。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二百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945万人。农村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之际,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逮捕、监禁和屠杀,第一次大革命被埋葬在血泊之中。在反革命白色恐怖面前,陈独秀推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下令收缴工人、农民的武器,限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的一部分部队,约3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决定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会后,毛泽东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随即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从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各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内深入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工农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使得国民党惶恐不安,他们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先后发动四次“围剿”,都被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1933年10月,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

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1936年10月,长征红军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又进兵热河,蚕食华北。1932年,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推行全面灭亡中国的方针。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开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

从1939年底开始,蒋介石集团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三次反共高潮都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挫败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特务横行,官僚资本趁机发国难财,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蒋介石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也开辟了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第二战场”。经过四年的奋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祖国大陆全境,国民党南京政府覆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举行。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

义革命基本完成。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历史阶段。这些斗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斗争实践的内容,都较前一历史阶段更广泛、更深刻、更丰富、更生动、更向前发展了。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哲学革命,就是在上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的。

二、无产阶级哲学革命阶段的古今中西之争

无产阶级哲学革命阶段也同以往的几个时期一样,始终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只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争论的具体内容与问题有所不同罢了。

这一阶段的古今中西之争,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政治思想领域内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古今中西之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西方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逐步开展;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日益尖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是维护中国封建旧制度,是继续面向西方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摆在中国各个阶级、阶层、派别面前的首要问题。为此,中国各个阶级、阶层、派别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竭力主张维护中国封建旧制度旧秩序。1915年以后出现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帝制运动,接着是大大小小封建军阀建立了统治与彼此混战不息,其后是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专政。一部分人,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则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统

治,要求独立、解放,既反对维护中国封建旧制度旧秩序,又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人民正是在上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指引下,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曲折斗争,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又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其次,与政治思想领域内“中国向何处去”之争相适应,五四时期发生了尊孔复古与“打倒孔家店”之争,和“新旧思潮”之争。以袁世凯、段祺瑞为首的封建军阀政府、封建卫道士康有为、陈焕章等以及帝国主义者,竭力宣扬尊孔读经、封建复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青年派则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对孔子之道与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主张文学革命,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引起了封建军阀和封建卫道士的仇视。他们迫害、攻击新文化、新思潮,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和进步人士的反击、批驳,1919年形成了“新旧思潮”激战的高潮。

第三,与政治思想领域内“中国向何处去”之争相适应,在理论领域内也发生了剧烈的古今中西之争。五四时期,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宣扬东方文化、“精神文明”,宣扬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宣扬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直觉主义,主张走“中国的路、孔子的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新青年派宣传的新文化、新人生观,反对唯物史观。与东方文化派产生同时,又出现了以胡适为主要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或“充分世界化”论,主张完全接受资本主

义文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宣扬资本主义文化和实用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攻击社会主义文化。东方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是五四时期后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文化和哲学领域内古今中西之争中两个最为重要并最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

国民党右派以戴季陶、蒋介石、陈立夫为主要代表,宣扬封建道统论,鼓吹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上,戴季陶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宣扬“民生哲学”、“仁爱”哲学,攻击唯物史观;蒋介石、陈立夫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宣扬“唯生论”、“诚”的哲学、“力行”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蒋介石、陈立夫在政治上作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理论上作了有力的批判。

1935年1月,陶希圣等人为了配合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组织控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及其刊物《文化建设》发动的封建复古、尊孔读经运动,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十教授宣言》),接着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各地分会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许多大学校长、教授、文化出版界人士出席座谈并发表文章,其后又出版了数十万言的《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一时恢复和建设中国封建固有文化之声甚嚣尘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强调所谓“根据中国本位”,即以中国封建固有的文化为基础,去吸取适合当时国民党统治需要的西方文化,其中主要是当时德意法西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和主张,所谓建设“中国本位”,实际上是封建复古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胡适批判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确地指出了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胡适又从其所谓文化有“惰性”、有“绝大的保守性”、“中国本位”无论如何不会毁灭的观点出发,认为中西文化大接触以后,“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①。

^①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质的文化建设〉》,《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83页。以下出自《胡适全集》的引文,只注篇名(书名)、卷数和页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配合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蒋介石在其统治区内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实行文化“围剿”。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思想界先后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所谓“唯物辩证法”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揭露和批判了托派分子、国民党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歪曲,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篡改和进攻,论证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教授宣扬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宣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提倡所谓“新儒家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的严厉批判。

第四,在革命队伍内,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逐步广泛传播。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民族特点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与革命者碰到的重要问题。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脱离中国社会实际、传统、民族特点,照搬照抄、生吞活剥。经验主义者不了解和不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拘守于本身的片断经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的优秀传统、民族特点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教条主义曾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斗争。

对于以上哲学上、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对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古今中西之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矛盾论》等著

作中,阐述了中国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发展及其性质,阐明了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关系,批判了封建复古论与全盘西化论,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中国传统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批判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等等。

以上是无产阶级哲学革命阶段古今中西之争的基本轮廓,它对无产阶级哲学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与各派的争论,不断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中国社会、历史、现状的实际,总结争论的成果,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的能力,从而推动无产阶级哲学革命不断深入发展。

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哲学革命不仅有其深厚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根源,并受到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影响,而且与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五四时期以前,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虽然已逐步输入中国,但总的来说,输入还不很多,比较薄弱、缺乏。

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西方自然科学大量输入中国,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原始与类择》,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自然创造史》等西方生物进化论的重要著作,都在五四时期翻译出版了。相对论、量子论、放射性学说、科学史等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据大致统计,从1917年到1923年上半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有关介绍、论述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著作、论文等达100篇;出版了有关相对论的书15种。在五四时期出版的162种期刊中,刊登了有关西方自然科学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论著,共约六百六十篇。^① 五四

^①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